

贺敬之与郭小川,新中国十七年诗坛上的一对双子星座。他们一起从延安出发,带着《讲话》精神滋养的才情,带着一个战士诗人对祖国对人民对共产党领导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爱与忠贞,豪情满怀地从解放区走进新中国。一样的理想追求,一样的美好向往;一样的革命情思,一样的战士襟怀;一样的意气风发,一样的热情奔放……他写《回延安》,他写《致青年公民》;他写《西去列车的窗口》,他写《昆仑行》;他写《桂林山水歌》,他写《青纱帐——甘蔗林》……视角不同却一样宏阔高远,风格有异却一样豪情澎湃血脉。他们吟唱的是创世纪时代的华夏最强音,他们抒写的是必将在中华文学艺术史上占有光辉一页的民族正气篇。

两匹骏马奋蹄颠簸并肩驰骋,是神州大地上一片永远靓丽的风景,却不是小文想要谈论的话题。这里要说的,是贺敬之写给郭小川的一封信。请看:

小 川:

两信均已收到。冯恺生病的情况我比你知道的晚。她怕我担心,老不告诉我。今天收到信,才告诉了我真实情况。看来,病是不可轻视的。但她坚持不回来治病,也不愿在本地去住医院。目前就是暂时停止了劳动,工作照常。她的精神是好的,老实说,使我有些感动。我回信给她,没有说别的,只是鼓励她以共产党员的态度对待一切困难。我只建议是否可以春节时回京来检查一下病(目前我还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实现这一点。我上次信上说要给乔羽写信,现在来不及写了,你是否就此事和乔商量一下,给我出个主意?)。你来信说已经给她买了药,真谢谢你。我还想到一点:肝炎需要营养,特别是糖。目前她在乡下每天只有两顿糊糊。你可否给她买些巧克力,以补病之急需?如雷平未走,可仍托她带去。如雷已走,可寄去。但要注意:一、事先不使她知道。二、包装要严,最好和药品在一起,注明是药品,以免弄出不好的营养(影响)。——你看可以吗?如可以就再麻烦你一下!

你信上说二月中下来,不要这样。身体无论如何还要一段休养时间。杜惠查病结果,望告。不知怎么的,一下子你们三个健康的人都病了,我倒还算是“壮丁”了。可见,事物的发展,常常会走到他的反面的,不要紧,都会好起来的,一定!

这几天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工作又往前走了一步。春节前可能更忙一些了。春节时大约要回京几天,据说还要留京整训几天。

不多写。祝你们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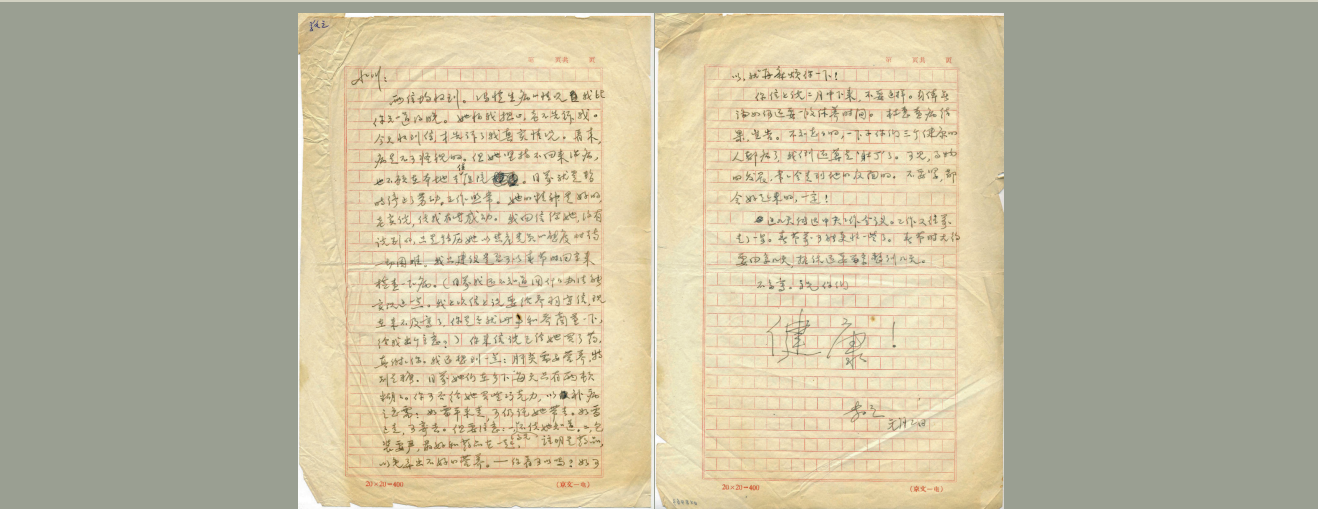
敬 之  
元月二日

上面这些文字,用最普通的钢笔墨水书写在最普通的红格稿纸上,最家常的话语述说着最家常的内容,甚至连文人简牍中最常见的一句格式性套话都没有,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正所谓随意中见熟稳,急切中现真情——贺敬之与郭小川的朋友情深,由此可见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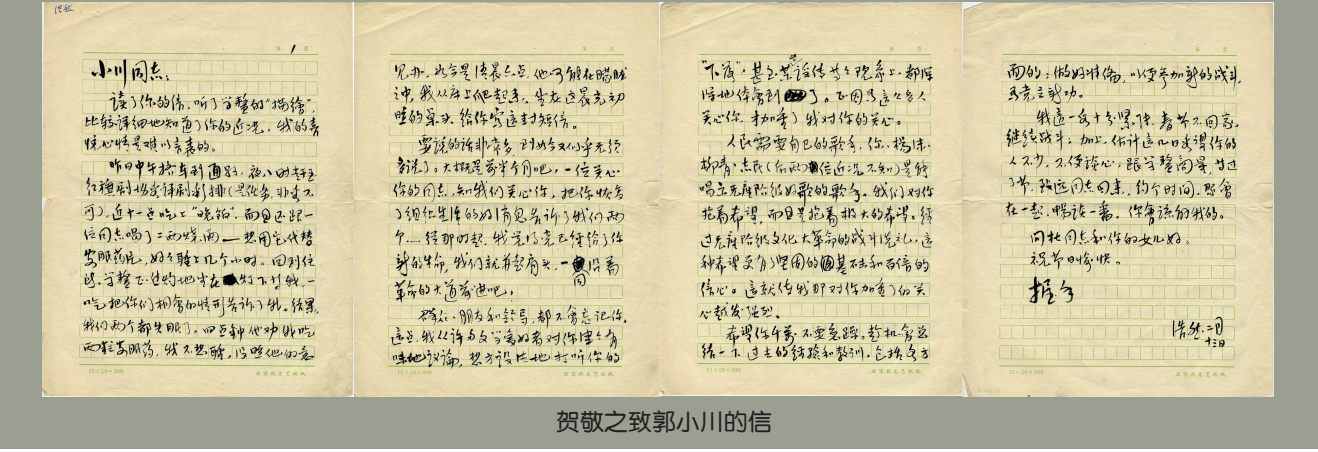
如果推断无误的话,这封信应该写于1974年。那是“文革”的第7个年头,各项工作都因为头年春天邓小平的出山而面貌一新。贺敬之信中所言“工作又往前走了一步”,估计与此大有关系。但全面整顿的工作毕竟刚刚开始,许多差错尚未及纠正,所以贺敬之还只能继续“下放劳动”着,也只能继续与妻子冯恺(即诗人柯岩)像牛郎织女般相望难相聚。这封信写于“元月二日”,再过20天就是1974年的春节。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贺敬之当时的思念之情可以想见!“春节时大约要回京几天,据说还要留京整训几天。”对于一对长期劳燕分飞天各一方的夫妻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千金难买的团聚机会!贺敬之不想错失良机,他希望生在乡下体验生活的柯岩能在“春节时回京来检查一下病”,这是他能想到的夫妻聚首的惟一办法,却“还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实现这一点”。曾经想过给乔羽写信求助,但“现在来不及写了”;请郭小川帮忙“出个主意”,明知道也不过是说说而已。焦虑啊,焦虑!不独因为对领导能否准假的担心,更因为害怕柯岩根本就不会去请假。几十年一路走来,贺敬之太了解自己的妻子了。她意志坚定、刚强乐观、真诚正直、胸怀坦荡,对祖国对人民的一腔深情,让她把一个巨大的“责任”揽进怀里挑在肩上,“工作第一”从此成了她永远不变的选择。她高度的党性原则给了她高度的自觉自律能力,时代倡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小车不倒只管推”,她就得了病却“坚持不回来治病,也不愿在本地去住医院”,只是“暂时停止了”重体力劳动而其他“工作照常”;组织要求与贫下中

## 贺敬之致郭小川的一封信

□许建辉



浩然致郭小川的信



贺敬之致郭小川的信

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她就坚守着“每天只有两顿糊糊”的日子而绝对不搞特殊化。柯岩的这些行为,让贺敬之很是“有些感动”,因为他和他不仅是生活伴侣,更是革命同志,他们既有着相同的思想境界,也有着相同的品格标高。所以他在“回信给她,没有说别的,只是鼓励她以共产党员的态度对待一切困难”,再就是想到“肝炎需要营养,特别是糖”,因而商请郭小川“给她买些巧克力,以补病之急需”。为避免“弄出不好的营养(影响)”,还特别嘱咐邮寄时必须注意:“一、事先不使她知道。二、包装要严,最好和药品在一起。”

冯恺(柯岩)“生病的情况”,郭小川能早于贺敬之知道,是因为头年里他曾受邀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过一段时间,任务是帮助修改《友谊的春天》剧本。柯岩自参加工作起即在该剧院供职,贺敬之信中提到的“雷平”就是她的同事。《友谊的春天》是赵云声与邢益助主创的一部以“乒乓外交”为题材的作品,旨在歌颂周恩来总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外交政策,故尚未出生就已为“四人帮”所不容,相关工作在数月前已被迫停止。郭小川长期患有肝炎、动脉硬化等疾患,心脏也不好,本该借此小无事可做之机好好诊治一番,但他不忍岁月蹉跎,稍微休整便急于离京投入新的工作。贺敬之对其决定不以为然,劝他“身体无论如何还要一段休养时间”,厚厚中肯的话里透着一份真诚的关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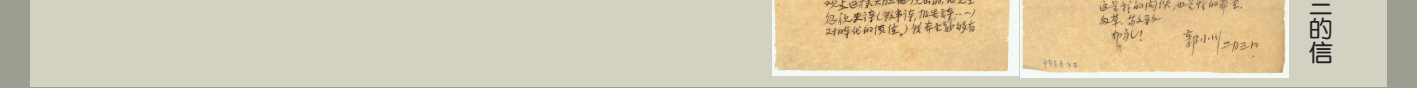
这封信,读后的第一感觉,竟是朦朦胧胧的“恍如隔世”。人的健忘真是一种可怕的疾患,短短40年弹指一挥,曾经的一切便都归于忘却。真得感谢贺敬之这份手札,它不仅白朴素的说述,于毫无疑义中为历史留下了一幅影像,不用人物灵动鲜活,写在人物背景中的标语口号也清晰可见,诸如“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抓革命,促生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等等。这些气势高昂节奏铿锵的话语是那个时代的“形骸代言”,虽因时过境迁而屡遭嘲讽,但它教化的毕竟是一种引体向上运动,比之那些海淫海盜惑人择手段去攫取一己私利的“励志箴言”,应该说还是大有高尚纯粹之处,因而不可同日而语的。或许正因为如此,当年的贺敬之与柯岩才会抛却个人利益,用自觉自愿的行为为之做出了形象的诠释与图解。

晚年柯岩也曾闲坐话当年,谈起曾经的一切,轻松的话语中洋溢着无怨无悔的自豪与欣慰:“我们那个年代搞创作是很艰苦的,每年要打着背包下去八至十个月,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论恋爱、结婚,生孩子……雷打不动。”“我的孩子出生才两个月,我就打背包下去了,一去一年,同吃同住,浮肿、肝炎就是那时候得的。”“我以前身体可好了,下部队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跟铁道兵比着扛枕木,他们照顾我们,只让扛一根;可真干起来,他们扛两根,我们也就拼命去扛两根;他们逗我们,有的就扛三根,三根我们是死也扛不动的,就气鼓鼓地,连长、指导员就批评他们……下温泉工读学校时,在黑山峪过去温泉那儿,我从来都是骑车去,穿过几个城区来回,跟小伙子一样干,但是觉得天经地义,你去了就不会不跟别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吗?当然你说没有点幼稚?也有点幼稚。但那时的我们确实是心比天高,壮志凌云,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至今想起来还是很好笑、很真挚、很充实的。”问其为何能这样,得到的回答是:“我见过朝鲜战场上牺牲的同志,见过被鲜血染红的山头,见过山头被削平几尺的焦土;我见过土改农村的干部、边防哨所的战士干部、工读学校的老师。我生孩子大出血,医生一救

## 郭小川佚信一通

□张 丹



郭小川致萧三的信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收藏中,有一封郭小川写给萧三的信。这封信没有收入12卷本的《郭小川全集》,互联网上也未见有其相关信息,故不妨以“佚信”视之,全文照录以飨读者。

萧三同志:

听说您已请假休养,甚念。本拟前往访问,又闻您要静养,不便扰乱您。同时,在校学习真太忙,连脑勺都累疼,这是因为我在外面跑了三天,对此环境一时尚不能惯熟。

我希望多读一些您的新作,而且是这样需要您的教示。

近来写了一些东西,苦无发表之地(自然我并不忙于发表的),延安的刊物真太多了。我预祝《新诗歌》之诞生。

另一方面,对作品的批评与理论的论争太不够,何其芳同志居然否定史诗——他是拿纯艺术的观点这样大胆地说出的,他完全忽视史诗(叙事诗、报告诗……)对时代的价值,我希望能够有适当的讨论与正确的解决。(至于)其他理论上的问题,如民族形式在诗歌领域之建立,如歌谣的处理问题……诸多问题都太需要讨论了……总之,延安的诗坛是寂静的,写诗的人的力量尚未能集中……写诗我还是初学者,但我顶愿意学习或研究一些问题。

我是这样感觉。

延安有人(乃至全国)之所以讨厌诗,正是因为诗还未能活跃的原故,出版……多来几次运动(如纪念某事的街头诗运动),一定会使很多人爱诗的吸引的,我想。

我希望您会同所有写诗的同志把延安诗坛活跃起来。

这是我的问候,也是我的希望。

勿草,敬致

布礼!

郭小川  
二月三日

这封信,应该写于1940年。推测依据有两个,都是信中提到的:一是萧三的“请假休养”,二是“《新诗歌》之诞生”。

先说第一个问题。萧三于1939年3月6日离开莫斯科,3月21日下午归国入境,3月25日到达乌鲁木齐,4月6日到兰州,4月21日到达西安,4月29日由洛川至延安,当天即被分配到“鲁艺”工作。开始他挺高兴,但时间一长就“觉得不合宜”,加之旧病复发,极其痛苦,只好给领导写信请假。信中写道:“在鲁艺要教书,要做文学系主任,要做编译处处长,此外要做干部教育小组组长,要做研究部文艺

史研究室主任,许多的事务工作,许多的会议,校外的社会的义务则有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常务理事,《文艺突击》《文艺战线》两个杂志的编委会。党的工作还有中央宣传部的文委,鲁艺的党团,时事问题研究员……又是许多的会议。这样一来无论书也教不好,编译也少成绩,联共党史研究常常脱期,研究工作尚未开始,社会工作也顾不到,每天从早到晚只是看别人的稿子,鲁艺内部学生及教职员的(因为我又是‘创作顾问会’的主席)和学校外面寄来请看的,看得头晕眼花。最伤心的是完全谈不到自己写作——我回国四个多月了,差不多一首诗、一篇小说都没有写,没有时间,写不出来!近来为筹备‘九一八’晚会及筹备会更加紧张了,结果,我病倒了!——脑病复发,每天晕的厉害,什么事也不能做,一点力气都没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请求脱离‘鲁艺’——不仅解放文学系主任,亦且不做编译处处长……”这封信的底稿如今也收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信后标注日期是“九月十九日”。

再说第二个问题。《新诗歌》(延安版)是由老诗人萧三创意并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亲自主办的,为报纸型刊物,马兰草纸四开单面油印,每期两版。1940年9月1日创刊。刊名下印有“延安战歌社、山脉文学社合编”(注:从第2期以后改为新诗歌会编)等字样。通讯地址为“延安文协转”。共出刊6期,于1941年5月20日终刊。

回头看这封信,郭小川在信末签署的日期是“二月三日”。从1939年9月18日萧三“请假休养”,到1940年9月1日《新诗歌》创刊,“二月三日”只有一个,而它只能属于“1940年”。郭小川在“1940年”的“二月三日”写信,正好往前可以问病,往后可以“预祝”“《新诗歌》之诞生”。目前研究界一般认为他到延安的时间是“1940年年底”,据此信看至少是在年初甚或更早一些时候。因为那个时间段内的延安文艺尚有待发展繁荣,所以郭小川信中感慨的“延安的刊物真太多了”正符合当时情况。《新诗歌》(延安版)问世后郭小川是主要撰稿人之一,等到翌年春夏之交该刊停办时,他则与当地的几位诗歌爱好者张薇(张沛)、高敏夫等联手创办了新的《新诗歌》,史称“《新诗歌》(绥德版)”。

从这封信不难看出,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郭小川就已经把“民族形式在诗歌领域之建立”的问题提到了“太需要讨论”的议事日程上;“叙事诗、报告诗……对时代的价值”等问题也都已进入他的关注范畴。作为一个“写诗”的“初学者”,刚满20岁的郭小川就具备了这种“顶愿意学习或研究一些问题”的视野和高度,他后来所取得的文学创作成就也便是毋庸置疑地水到渠成理所当然了。

(上接第5版)

“你想过没有?生活该有多么丰富!”//将军有些倦了,/弓身坐在河边。/仰起头,/把高空饱看:/明月,/青天,/繁星,/大山,/银河,/云烟。//将军说:“想想吧,世界多么久远!”

——《将军三部曲·月下》

多么精当真切的描写、多么精练简洁的语句!郭小川的叙事诗就是这样注重意境的营造。这些新鲜形象的词语再辅以合理安排、自然婉转的声韵,一下子就将我们带入了他精心创设的典型环境。

郭小川对于外国诗体的引进改造、对于古典诗词的消化吸收、对于民间歌谣的学习借鉴,都使得他在诗艺方面独树一帜,成就斐然。他是公认的形式革新能手,在新诗形式方面的探索,始终伴随着他的创作生涯,并在不同阶段结出令人瞩目的硕果。“楼梯式”、“民歌体”、“新辞赋体”、“半散曲式自由体”、“自由体”,风格迥异但都精到壮美韵味十足,准确地传达出了诗人各种状态下涌动的诗情。以《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为代表的“楼梯式”“警警醒目、斩钉截铁,使诗歌语言的分量和感染力大增,尤其适合在20世纪50年代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鼓舞人心士气。以《祝酒歌》为代表的“半散曲式自由体”则用参差错落轻快活泼的短句,抒情言志催人奋进。尤其为人称道的,当属以《厦门风姿》《甘蔗林——青纱帐》等为代表的充分吸取了古代辞赋骈偶对仗、敷陈堆叠特点的“新辞赋体”,人们也喜欢称之为“长篇幅句体”或“郭小川体”。短句长排,辅以对偶、排比、叠用等修辞手段,表现宏阔丰富的思想感情,是何等雍容气派、何等典雅豪迈!那些密集的意象、锻造得铿锵和谐的声音,带给我们的是痛快淋漓中的定位期待,定位期待里的痛快淋漓。在你心绪低落,意志沉沉的时候,大声朗诵《向困难进军》《甘蔗林——青纱帐》《青纱帐——甘蔗林》《乡村大道》《祝酒歌》《团泊洼的秋天》《秋歌》吧!我相信,它们依然能为你昂扬意气,凛雪精神!

(上接第6版)

这种个体言说部分地溢出了革命话语言说的规范,然而,正是这些诗歌彰显了诗人的真诚本色。比如,同志之爱的丧失让他陷入了沉思:“一切胜利、欢呼、笑和拥抱/同志的爱、理解和友谊/我再也不能亲眼看到了/但这一切都是我的”。(《郭小川文集》)再比如,《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白雪的赞歌》等三首叙事长诗从个体的心灵感受向世界出发,对理想、信仰、宇宙等形而上主题做出了远远超越同时代人的思考,他也因此而获得了读者的认可,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我们不妨对诗人的创作习惯作简单分析:1957年春夏,反右运动正如如火如荼的开展,批判会议一个接一个,这都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郭小川身心疲惫,内心极度苦闷、敏感的诗人开始体悟到了个体的渺小,开始思考人性与党性、理想与信仰、个体生死与宇宙存在的关系。“谈了人的生死和宇宙的问题。……一想到宇宙,就感到人太渺小了,但人是不会自己毁灭的,生活的力量对人能够吸引住,都会津津有味地活下去,创造着一切。”(《224》)诗人身处1957年作协机关那种风雨之地,深深地感到了周遭袭来的压力,他要把自己从1957年的境遇中突围出来。“由于一些情绪问题,时常扰乱我的诗思,我非解脱不可,这个月写的写作无成绩,此事占了很大的比重。”(8.31)他要在诗歌写作中求得解脱,因为只有诗歌才能够赠予他一定的自由。郭小川的爱情发于延安,是在“革命+爱情”的模式中建立家庭的。但是,他的爱人杜惠在延安整风中,曾经受到审问,而在1957年12月又差点被东郊区委列为右派。这种思想或经历也直接在这三首诗歌中得到详尽表现。《深深的山谷》中的男主角产生了逃避革命工作的思想,《一个和八个》提到的“肃反”、“审干”及“斗错人现象”,《白

救好多个钟头,血库里的血浆不活泼了,医生、护士现抽自己的血救我……生活里这些平平常常的,但又是英雄的事迹使我相信,我们的党、我们的生活光明是主要的。”“生活就是有好好的东西,有值得你活下去的东西,有值得你去为之奋斗的东西。我觉得社会主义事业就是这样,它值得我活下去,为它奋斗,值得我为它受苦受难,值得我为它又哭又笑……”

柯岩的这些自述,可以说是对贺敬之手札的最权威注解。还有一些可作注解看的文字,则是郭小川收藏的另外一些信件。它们同样产生于1970年代,那个年代里郭小川的生活最是起伏不定动荡不安。人如浮萍倏忽西东,这些信件却能于“南征北战”之后完好无损,可见他对它们是何等珍视。杜甫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而在动荡不安的非常岁月里,朋友信中那种“志同道合”的理解、信任、支持和鼓舞,对于郭小川来说应该更是一种格外的心灵慰藉。请看:

1970年6月,郭小川获得“解放”。旋即被五七干校军宣队调到大队搞“专案”工作。女作家丁宁得知,特意写信鼓励:“小川同志:在京时听说你留干校搞专案,只不知是短期还是长期?我原希望你别早回《人民日报》,早投入工作,看来一时走不成了。专案工作很重要,老同志做这工作,有经验,有常识,一定会做得很好。”

1972年9月,郭小川被国家体委从湖北咸宁借调回京,几个月后写出了报告文学《笨鸟先飞——记少年庄则炼的训练生活》,拟发表于复刊的《新体育》1973年4月号。消息传开,作曲家田歌的贺信从数千里之外的乌鲁木齐飞来:“小川,亲密的同志!听说你的文章即将问世,在此向你祝贺。四月号《新体育》望能寄给我一册。一篇文章,你反复六稿,时历三个半月,足见你对艺术锤炼如此精心,真是一丝不苟。这种严肃的创作作风,真值得我很好学习。”

1973年7月17日,郭小川的新作《万里长江横渡》完成,这是为纪念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以73岁高龄在武汉第17次横渡长江而写的一首长诗。作品尚未面世,诗人严阵先已“鼓掌”:“您善于抓住并表现重大题材,《万里长江横渡》,先看命题已使人感到不同凡响,我希望能早些读到它。您1970年的横渡,迎风击浪,胜利地登上彼岸,在一生的政治历史上和创作上,都是带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的。我一贯坚信:不论在政治上或是在创作上,您经过大风大浪的锻炼考验之后,都已面临着更新的一个更新的更光辉的起点。我简直心热得也想写这样一首诗。”

1973年8月24日,郭小川突然接到体育报社要求他“停止写作关于庄则栋文章续篇”的通知,形势突如其来急转直下,各种谣传随之纷纷扬扬。远在内蒙古的大学教授匡汉生生怕郭小川顶不住吃不消,鸿燕传书殷殷劝慰:“社会是个复杂存在,有点小风即刮大浪,也不奇怪。作为老同志,望您正确对待,经住考验,稳定情绪。像马克思一句名言所说,任它去吧,照样走自己的路!只要无愧于党,只要为人民做好事、写好诗,群众眼睛是亮的。”

1975年10月,从1974年8月开始的隔离审查宣告结束,郭小川再次获得“解放”。作家浩然从朋友处听说时虽已是“旧闻”,却依然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早晨6点就爬起来,“坐在这晨光初照的桌头”给他写信:“要说的话非常多,到如今又似乎无须多说了。大概是前半个月吧,一位关心你的同志,知我们关心你,把你恢复了组织生活的好消息告诉了我们……从那时起,我觉得你已经给了你新的生命,我们就并起肩头,一同沿着革命的大道前进吧!群众、朋友和领导,都不会忘记你,这点,我从许多文学爱好者对你津津有味地议论,想方设法地打听你的‘下落’,甚至某些谣传等现象上,都深深地体会到了……希望你千万不要急躁,趁机会总结一下过去的经验教训,包括各方面的;做好准备,以便参加新的战斗,为党再立新功。”……

无需赘述,仅此几例,已足以展示出属于那个时代的话语特点与精神风貌。若以之为背板底色,与其匹配最和谐不谐的前置词,就应该是郭小川当年写下过的那段颇有影响的文字:“我们的诗人的义不容辞的战斗任务,就是用热烈的爱国精神,以及为了祖国的优越而有的骄傲感,歌颂自己的伟大祖国,歌颂祖国人民的伟大生活,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心。”“投入火热的斗争,是我们这时代的人的庄严职责。”“如果我们的诗人真正担负起这项光荣的任务,他将发挥其独特的、别人所不能代替的巨大力量。”